

贵州历代诗刻的文化内涵与文学意蕴¹

谭德兴

(贵州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 贵州历代诗刻资料丰富, 主要包括摩崖、诗碑、碑铭、铁柱铭等。现存最早的是南宋时期的诗刻, 最晚至民国时期。贵州诗刻内容较广, 涉及贵州政治、历史、文化与风景名胜等。贵州历代诗刻的作者数量众多, 其中很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和文学家。贵州诗刻无论在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方面均极其珍贵, 其所呈现的不仅仅是贵州区域文化的特征, 还与整个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亦息息相关。

关键词: 诗刻 史料 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 (2018) 11-036-042

一、贵州历代诗刻的存佚与时空分布情况

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 建省前的区域分属于邻近的湖南、四川、云南、广西等, 建省后的省域范围在不同朝代有所差异故仅依照今属贵州省域范围来考察贵州历代诗刻情况。

在“诗刻”的界定上, 则采用相对宽泛的概念, 即, 凡属形式对称整齐的韵文作品均酌情列入考察范围。如袁桷《杨汉英神道碑铭》、幸化龙《铜鼎铭》、郭子章《建神武祠碑铭》、焦尔厚《饮泉铭》、鄂尔泰《铁柱铭》、勒保《铁柱铭》均为整齐四言韵文, 多模仿《诗经》写成, 故列入考察。又如王阳明《瘞旅文》碑, 虽然整篇作品名曰“文”, 但后半部分却是大段骚体诗歌, 故亦列入考察范围。再如像赞之类, 如阳明祠中阳明先生画像赞, 大多为形式整齐的韵文, 亦列入考察。墓志铭的铭部分, 虽然亦有诗的因素, 但形式杂糅, 且已成为专门文体, 故不列入考察。对于建国后, 特别是“文革”后以及当前发展旅游文化需要所重刻或新刻的诗碑因其可靠性较低, 在此不纳入考察范围。

在诗刻数量的计算办法上: 首先, 摩崖诗刻以一人作品为 1 方, 如黎平祠山宫摩崖诗刻有陈天策、孟道善二人唱和作品各 1 首, 计 2 方。其次, 只有拓片和著录诗文的, 无法确定原碑数量的, 以一部(或系列)诗作为一方, 如杨芳《思亲诗》(十首)计 1 方。其三, 无法确定诗碑所立地域的, 均划归作者原籍计算, 如杨芳《思亲诗》碑等, 归入铜仁(松桃)诗刻内。根据以上原则, 我们对贵州历代诗刻的分布地域、时代、作者、文体以及原石及诗文存佚情况进行统计, 绘制成表(具体参见表 1)。

从表 1 可见, 贵州历代诗刻 168 方, 其中亡佚 67 方, 存世 101 方, 涉及诗歌 340 首。虽然贵州历代诗歌的刻石活动频繁, 但由于战乱以及保护意识不强, 历代诗刻原石毁损与亡佚也比较严重。不过, 现存贵州诗刻数量约占总量三分之二, 基本上还是能够体现贵州各个时期的诗刻风貌。但存世的诗刻原石, 由于社会环境变迁, 很多位于废弃的山洞、荒芜的山林、人迹罕至的崖壁, 只有很少部分收在贵州省博物馆和各地州县文物部门, 其历史与文化价值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利用。贵州诗刻所存原文远比原石要多, 这是因为贵州方志十分发达, 历代方志对各地石刻文献著录意识较强, 故很多被毁诗碑的诗文得以在方志中保存, 加上历代文人雅士对石刻的喜爱, 不断进行拓摹, 故为研究贵州各个时期的诗刻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¹基金项目: 贵州省 2017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贵州方志艺文志整理与研究”(17GZGX11)。

作者简介: 谭德兴, 文学博士、博士后,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贵州地域文化。

表1 贵州历代诗刻统计表

地域	时代				作者				铸者				文体										存		佚				
	宋	元	明	清	民国	省外	省内	省外	省内	三言	四言	五古	五绝	五律	六言	七古	七绝	七律	歌行	杂言	骚体	联句	铭	赞	原石	诗文	原石	诗文	
贵阳	甲秀楼			20		19	1	19	1			4					32	3				1	2		6	42	14		
	黔灵山		1	12		6	3	6	3				2	3			4	5							5	14	8		
	雪涯洞			11		6	5	6	5					1		1		31									33	11	
	阳明祠			1	20		16	5	1	1			2	5	1	3	11	3						6	21	31			
	阳明洞			3	13	2	14	1	14	1			4	5	10		3	1							16	23	2		
	其他				8		5	3	3	5					2	2	1	4	1		1					3	11	5	
遵义城区	桃源洞			11	2		11	2	11	2		3	1	5			5	16							9	30	4		
	普济桥			1				5		5	2		1							2					1	5			
	大觉寺				2		1		2								1	1							2	2			
	其他		1	5	6		9	2	8	3		1	5	15	4		1	2	1				3		2	31	10		
遵义其他地区	桐梓	1			2		1	1		2		1				2	2								3	5			
	湄潭				3		2	1	2	1				3		1										3	4		
	其他			5	1		4	2	4	2			1			1	1	4							6	7		2	
黔东南	黄平			3	3		6		6				1			2	4	2							5	9	1		
	青龙洞			1	3	1	3	2	3	2			1			1		3							1	5	4		
	黎平			2	2		2	3	2	3			1				2	1	1						1	5	3		
	锦屏	1		1			2		2							1	1								2	2			
铜仁	文笔洞			3			3		3					1				4							3	5			
	其他			1	2		1	2	1	2		1					11									12	3		
黔西南				3		3		3				2		4		1	6	8							3	21			
黔南				4		2	2	2	2				1	2				3							2	6	2		
毕节	黔西				3		2		2			2		4		1	7	7							3	21			
湖南	永州九嶷山		1				1		1							1									1	1			
江苏	盱眙				1		1		1								4								1	4			
安徽	怀宁				1		1		1			6													1	6			
四川	什邡				1		1		1					5											1	5			
总计		2	2	38	123	3	118	44	100	44	2	1	33	26	48	3	16	97	97	2	2	1	1	5	6	101	340	67	2

贵州方志收录诗刻文献主要集中在《艺文志》《金石志》和《古迹志》中。例如，道光《遵义府志》的《古迹志》《金石志》和《艺文志》中便记载了很多与遵义有关的诗刻资料。民国《贵州通志》的《金石志》按时间顺序汇集了各方志中的石刻史料，其中对诗刻资料的收集比较全面。建国后，有关文物普查工作以及《贵州省志·文物志》《贵阳市志·文物志》《遵义地区文物志》编纂等对贵州诗刻记叙也比较详细。但经过“文革”的“破四旧”浩劫，贵州各地诗刻原石毁损较多，如黄平飞云崖、贵阳黔灵山、甲秀楼系列诗刻很多被毁。目前对劫后余存数量一直没有进行系统考察与统计。《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19卷、20卷收录的是贵州省石刻资料，其中涉及部分诗刻。但该文献多据拓片载录，其中很多文字漫漶不清，且很多诗刻的信息说明有误，而且对贵州石刻和诗刻资料的收录缺漏甚多。

贵州历代诗刻的发展很不平衡。从诗刻的时代分布看。宋代2方，元代2方，明代38方，清代123方，民国3方。其中近代69方。各个时期诗刻的数量很不均衡。贵州诗刻时代分布的不平衡性，说明了贵州与历代中央政权的关系以及贵州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特点。

其一，贵州自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之前，贵州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时疏时密，有时甚至处在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元代副使范汇《八蕃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说：“八蕃顺元相传为夜郎祥舸之表，殆古鬼方之境欤。蛮獠种落杂处，叛服不常。”^[1]“叛服不常”很好地说明了明代之前贵州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南宋理宗景定辛酉年（1261）张汉英的《诸葛洞石壁诗》记叙南宋王朝对贵州锦屏苗族的征讨，这是贵州建省前与中央政权关系紧张的典型案例。明代贵州建省，特别是改土归流，贵州才真正意义上被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这种政治上的归属，也促使了文化上的快速发展。外省人黔的官员，往来的文人骚客以及贵

州本土文人频繁出黔，使得贵州处在了一个文化发展繁荣期。特别是王阳明入黔且于龙场悟道，对提升贵州文化品格产生巨大推动作用。故自明代始，贵州的石刻史料逐渐丰富，特别是诗刻逐渐增多，这是贵州文学与文化获得发展的标志。

其二，近代（清道光至民国初期）贵州诗刻数量几乎占据贵州历代诗刻总量的一半。尽管在时代分布上，明清占主要部分，其中清代明显多于明代，而近代诗刻则又明显占强。近代是贵州文化发展较为繁盛的时期，贵州的文化名人主要出自近代，如张之洞、李端棻、丁宝楨、黄彭年、傅寿彤、郑珍、莫友芝、黎庶昌、陈夔龙、姚华、朱启铃等，贵州建省 600 年以来有进士共 700 人，而近代 88 年中就有 313 人，占了将近一半。贵州历史上的两个文状元赵以炯、夏同龢均出自光绪时期。单从人才数量看，近代贵州无疑是一个人才辈出的爆发期。外省的文化名人也在近代与贵州交往频繁，如段玉裁、阮元、曾国藩、胡林翼、林则徐、何绍基、翁同书、吴式芬、洪亮吉、吴寿昌、吴嵩梁、黎培敬、严修等，均与贵州文化发生过密切的互动。故近代贵州诗刻数量充分反映了近代贵州文化的繁荣，其中很多省外名人在贵州留下了诗刻，这也是近代贵州文学获得极大发展的体现。

从诗刻的空间分布看。大多分布在交通发达地域。交通发达程度往往对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直接影响。自明代始，中央政权为了更好地控制西南边疆，加强了对贵州的交通建设。明清时期贵州的交通建设主要体现在驿道上。驿道分省际干道“官马大路”、省道干道“官马支路”以及县道“大路”。^[2]很明显，贵州历代诗刻主要分布在“官马大路”和“官马支路”上。例如，东西干道滇黔、黔湘的“官马大路”便是以贵阳为中枢的驿道。这条驿道自明代便已铺设，其中的镇远、黄平、贵阳、修文等均是诗刻较多的地方。还有一条东西干线即平溪、镇远、播州、水西至乌撒，其中镇远、遵义诗刻最多。南北干线之一自贵阳、修文、息烽、遵义、桐梓北人

四川，其中，贵阳、修文、遵义、桐梓都是诗刻较多之地。清代铺设的驿道之一镇远、黎平至古州等，其中镇远、黎平、古州都是诗刻较多之地。可见，东西干线与南北干线交汇的贵阳、镇远、遵义等是诗刻最丰富的地方。交通发达，则文人墨客往来频繁，无论官方或私人活动都较为集中，自然留下的诗刻亦多。反之又对当地政治、文化及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贵州有些诗刻分布在省外，如杨汉英《咏九嶷图诗》碑在湖南永州、贺绪藩《游玻璃泉诗》碑在江苏盱眙、莫友芝《书示弟祥芝诗》碑在安徽怀宁、牟思敬《自书方亭诗》碑在四川什邡，这些是贵州文人在省外活动的见证，属于贵州文化之输出，也是贵州文化与省外文化频繁互动的结晶。

从诗刻作者群体分布看，主要有三类：其一，流官。在贵州做官的省外人士很多，这些官员大多具备较高的文化与文学素养，在贵州仕宦期间，写下了很多诗文学作品。其中不乏优秀的诗刻。如郭子章、鄂尔泰、洪亮吉、翁同书、吴式芬、吴嵩梁等；其二，途径贵州的文人。贵州是人川、人滇等必经之地，贵州秀丽的山川、奇伟的自然风光是催发过往文人墨客诗情的良方。途经贵州的政客、学者和文人几乎都留下了对贵州自然景色与人文风光的赞美之辞。即使短暂停留与匆匆一瞥，这些过往的行人也往往情不自禁在名山大川间挥毫泼墨，留下一篇篇佳作，其中就包括不少诗刻。诸如袁桷、丁玘、夏言、和珅、阮元、何绍基、林则徐等；其三，贵州籍人士。贵州本土文人自然也是诗刻作者的重要群体。诸如，郑珍、莫友芝、贺绪藩、陈夔龙、花杰、杨芳等一大批文人留下了丰富的诗刻作品。贵州历代诗刻作者的分布，也体现了贵州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即省外与省内文化的密切互动。省外作者和携者明显占多数，可见，贵州文化和文学发展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贵州文化的发展实质上是频繁与省外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贵州建省较晚，建省前贵州区域多分属于邻近的湖南、四川、云南、广西，这使得建省后的贵州天然具有了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各种文化间的交融互动是贵州文化发展的一大动力。同时，改土归流后的贵州，同样因政治因素而具有了独特的文化交融特点，从省外来的流官，带来的不仅是先进的政治管理制度，而且也同时带来全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兴儒学、建书院、开科举等一系列文化措施，使得贵州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互动，推动贵州文化迅速发展。

二、贵州历代诗刻的主要内容

贵州历代诗刻文化内涵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反映了贵州各个时期历史文化发展的真貌。

（一）纪功与颂德

石刻因其材质特点，可传永久，以垂不朽，故最适合用于铭刻功烈、歌颂美德，从而移风易俗，发挥风教作用。诗刻自然也不例外。贵州历代诗刻在歌功颂德方面特征明显。叙述家族及个人功业的，如元代袁桷《杨汉英神道碑铭》、明代郭子章《建神武祠碑铭》；记叙平叛战功及宣示教化的，如南宋张汉英《诸葛洞石壁诗》、明嘉靖梁福《白岩塘诗刻》、万历刘铤《平播凯旋述怀》《平播凯旋书佛图关石壁》、万历李化龙《铜鼎铭》、清雍正鄂尔泰《铁柱铭》、嘉庆勒保《铁柱铭》等；赞颂美政及对民生之功德的，如《颂毛燾苍德政诗碑》《官渡修路诗碑》。其中又以记叙平叛战功及宣示教化的诗刻最多，例如，南宋时期的诸葛洞石壁诗：

罗细龙池傍密峦，恃其巖洞呈凶顽。狼烟才举蛮烟净，噍类无遗骨满山。招降讨叛得其宜，蛮蜒闻风畏我师。丁米官资安谕了，从今用夏变诸夷。赫赫王师下九天，风除霆扫净蛮烟。这回招讨成功了，谈笑封侯则易然。

——景定辛酉戊戌月古随张汉英书^{[3]1221-1222}

此诗刻现存贵州锦屏县诸葛洞内石壁，属贵州诗刻中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作品。诗篇以七言古诗体写成，叙述了南宋时期，朝廷对锦屏苗侗部族的征战。与该诗刻同时刻在洞中石壁上的还有张汉英的《诫谕文》：

我朝大观初元，筑隆州于湖耳，越十年而废之，自是不沾王化几二百年。景定辛酉，靖守徐将军巡边，蛮酋诱而害之。夏五月，当职被除守靖，且为招讨，计秋八月，京湖吕相公调聚兵马毕会，遂进师攻讨。千万兵马，大弓长戟，威震岩谷。是役也，当职凛阃牌之，指授一意以生灵为念，不事杀戮，故临阵招降数次。奈狼子野心，仍陆梁故态顽然弗率，不得已而加兵，至于青烟断野，白骨枕途。岂是当职之本心哉？其至今既除之后，各训尔子孙，弃尔弓弩，毁尔牌甲，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率丁男少壮，从事田亩，男耕女桑，各归圣化，永为良民。毋操刀以仇杀，毋偷牛窃马以生事，毋坐草捉人以徼富，毋抵抗税课以欺官。有一于斯，戮无恕。故兹戒谕，各仰通知。郡太守张开国书于景定辛酉戊戌月。^{[3]1221}

大观乃宋徽宗年号，而景定则为南宋理宗年号，景定辛酉为公元 1261 年。《诫谕文》十分清楚地记载了南宋军队与锦屏当地苗、侗少数民族的战争，诗句“噍类无遗骨满山”与《诫谕文》“青烟断野，白骨枕途”相互印证，说明了当时战事之惨烈。该诗刻与《诫谕文》石刻所记录的历史事件不见载于任何历史文献中，而且这也是南宋将领张汉英唯一留存的诗文作品，因诗文而存人存事，诸葛洞石壁诗文保留的这些史料极其珍贵。当然，诗、文均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宣示对贵州“蛮族”的征讨战功，警示当地少数民族不得反“叛朝廷”。但这正是贵州建省前与外部政治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

（二）记游与写景

贵州自然风光秀丽，名胜古迹较多。历代文人墨客，无论是为宦还是游历至黔，无不探幽寻胜，留下了很多优美篇章。贵州历代诗刻中关于记游写景的篇章很多。往往围绕一个景点，历代文人在前人基础上又不断进行增衍，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风景名胜系列诗刻。例如，遵义府城诗刻系列，比较著名的有明正德年间杨斌的《桃源洞诗刻》（3 首）、《大游仙诗》（5 首）、《鹤鸣洞风景》（4 首）、《紫霞山石室碑记》等；明正德年间白飞霞等《普济桥石壁诗刻》（5 首）；明万历时期刘铤《桃源洞绝句》（七言、五言各 1 首）、童仲揆《游桃源洞》、程仲愚《桃源洞纛壁诗》；明末周志伟《桃源洞诗刻》；康熙时期闵相的《大觉寺系列诗刻》（3 首）；嘉庆时期赵遵律在桃源洞刻李白《白田马上闻莺》《赠徐安宜》等^{[4]117-164}。遵义是贵州文化重镇，在清雍正之前属于四川，深受巴蜀文化影响。雍正以后划归贵州，一直是联结四川与贵州的交通要道与军事要塞，历代文人墨客途经遵义的不可胜数。留下的诗刻数量也比较多，见证了遵义在贵州历史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再如，贵阳的风景名胜很多，故亦留下了不少诗刻，最多的当属甲秀楼和黔灵山。甲秀楼，建于南明河中的一块巨石之上，历明清两代，屡毁屡修，为贵阳著名人文景观之一。“甲秀”取“科甲挺秀”之意，甲秀楼亦成为黔省首府人文荟萃标志。历代文人墨客题咏甲秀楼甚多，留下的诗刻数量不少，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收录的甲秀楼诗刻共十七组^{[4]152-163}，从雍正至咸丰，涉及 23 篇诗歌，属现存贵州风景名胜中金石资料较多的。黔灵山为贵州佛教名山，山中人文景观甚多，历代文人墨客题咏也不少，其中保留下来的诗刻也很多。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收录黔灵山诗刻五组^{[4]152-159}，现存诗刻涉及诗歌 12 首。因为黔灵山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尤其是弘福寺闻

名遐迹，故诗刻大都禅味甚浓。

关于贵州风景名胜诗刻，涉及众多省外著名人物，其中有些资料弥足珍贵。例如，和珅的《飞云崖》碑：

知予传呈……道风终古难吹去，下有僧人不觉曙，雾起朝朝云不开，何年古佛锡飞来，云根幻出黄金相，贝华封成碧玉苔，危亭絜阁系岩半，望飞云缥缈烟霞，絜仿佛如同羽化，昇来翻恐径尘绊，食语絜童让我先，今朝平地忽登仙，家中鸡犬劳相挈，客裹琴书莫浪捐，忽然一阵峦风起，飘拂长林声震耳，恍如棒喝顶门惊，唤醒痴迷悟方始，禅机岂可妄相求，我对石言石点头，系缕牵缠尘絜重，溪山啸傲宦情投，淳汗沾肌岚风冷，后兹更觉发深省，坦夷心地自清幽，世间处处皆仙景。策马依然挥玉鞭，回看绝壁矗青天，山云不许游踪恋，顷刻飞云罩暮烟。^[5]

该诗碑毁于文革，残碑于1982年被文物部门从飞云崖附近田野中找回。和珅《飞云崖》诗创作于乾隆四十五年，当时三十岁的和珅受乾隆指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由湘入黔，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由黔入滇，途经黄平，游飞云崖，有感而作。诗篇对飞云崖的奇特景观作了细致描绘，如悬在半空的危亭絜阁、虚无缥缈的飞云烟霞，使得诗人恍惚如入清幽神仙世界。而突然一阵诵经声，将诗人拉回现实世界，于奇峰空间感悟到了禅机妙谛。和珅于贵州黄平的飞云崖中似乎对人生和现实世界产生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特殊的人与奇妙的景发生碰撞的结果。和珅此行要决定一些人的生死命运，人世间的贪欲使得云贵总督李侍尧处在了风口浪尖之上，而这种转瞬即逝的身外之物在长林层峦的自然美景和声声入耳的禅语中显得如此虚无。“淳汗沾肌岚风冷，后兹更觉发深省”，这是和珅于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体悟，最后认识到“坦夷心地自清幽，世间处处皆仙景”，即只要人的心地坦夷，则人间处处都是美景。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和珅早年正处在仕途上升期的心境体现，诗人将之在飞云崖前抒发，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勉励与警醒。但很可惜，这种认识并未在和珅人生中被一以贯之。该诗刻未见载于关于和珅的任何文献资料中，和珅《嘉乐堂集》也未收，显然，该诗刻对认识和珅及其文学创作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三）咏史与怀古

贵州虽然偏处一隅，却与不少著名历史人物关系密切。受事件与人物的影响，亦产生不少相关诗刻。如明代建文帝的《罗永庵题壁诗刻》（3首），朱艘凭吊南明兴义小王朝十八忠烈的《吊十八先生墓诗碑》，遵义地区关于李白的系列诗刻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要数王阳明系列诗刻。王阳明谪守龙场，虽然时间只有短短三年左右，但龙场悟道是阳明思想形成的最关键时期。贵州阳明文化的影响力十分巨大。阳明文化遗迹甚多，其中诗刻数量也不少，充分表达出后人对阳明先生及其思想的推崇与景仰。其怀古意味浓厚。例如，王阳明《瘞旅文》之歌碑：

歌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吾与尔遨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璃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为悲兮！道旁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餐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尔安尔居兮，无为厉于兹墟兮！^{[6]70}

此歌属于骚体诗，作于明正德四年（1509）。创作动因缘于自京来一吏携一子一仆往黔赴任而皆死于龙场蜈蚣坡下。王阳明有感同是天涯沦落人，又感生命之无常，亲率二童子往瘞三人尸体，并为之悲歌。蜈蚣坡在修文县城西二十里。清乾隆八年山东通判孙鄂到修文，与县令王肯毅一同寻访三人坟，经多方打听，最后在一70岁老人的带路才找到，但坟墓毁圮，荒草掩盖，几乎湮没。孙鄂捐资，王肯毅负责操办，将三人坟修筑一新，并刻碑以纪事。^{[4]114}后人又将王阳明《瘞旅文》刻石，立于坟侧供游人凭瞻。三人坟墓碑毁于民国年间，《瘞旅文》碑毁于“文革”。又如，修文知县许大纶录书王阳明《龙场草庵》《小洞天》《西园诗》诗碑，道光二十六（1846）刻石，碑在修文县阳明洞内。^{[6]122}再如，吴振械书录王阳明《龙岗漫兴》诗碑，道光二十六年

(1846)刻石，碑在修文阳明洞内。^{[6]139}这些诗碑，都是将王阳明诗作刻石，无不出于对阳明先生及其思想之推崇与景仰，怀古色彩十分浓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仰慕王阳明所作的《三岛毅诗碑》：

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此诗为日本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所作。诗碑载三岛毅《序》：

明治癸卯岁，门人清宫宗亲，从高山、金子两武官访贵阳阳明洞，遂登龙岗山观月，有记寄示余，因赋此诗，顷两武官与宗亲等谋，欲刻之石以置祠中，远问余。余之诗虽甚恶，亦足以表海外景仰之意。则不辞，书此以赠。^[7]

此序说明了作诗的缘由和刻石的原因。碑上落款者为日人高山公通、爱甲猪之助、木藤武彦、空子新太郎、冈山源六、岩原大山、清宫宗亲。立碑时间用日本和中国纪年同时书写：“明治三十七年九月光绪三十年八月。”立碑者云：“同人既获博士诗，即拟在修文县阳明洞中勒石。惟其地去省稍远，至自吾国者追攀不易，爰就省垣绅士于君德楷一再商之，遂改建于扶风山之阳明先生祠，是固非始念所及也。然竖碑遗像之旁，则追随素愿，已足伸于贵山富水之间矣！”^[7]据此可知，此碑原本打算立于修文阳明洞，后改建于贵阳阳明祠。据立碑者的口吻足见日本人对王阳明及其思想之无限崇拜。

(四) 思亲与悼亡

生离死别是人生极度愁苦之事，也是最易触动诗人灵魂的东西。古人多借助诗歌以抒发对亲人和朋友的思念与哀悼之情。这类诗歌在贵州诗刻中亦不少。例如，杨芳《思亲诗》(10首)碑。杨芳，贵州松桃人，晚清名将，被道光皇帝封为果勇侯，为贵州封侯第一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带兵抗击英军，曾平定新疆叛乱，对维护国家统一作出较大贡献。由于长期在外奔波，故与父母亲人团聚的日子极少。其在羁旅行役中读到元代许衡《七月望日思亲》和明代薛瑄《读许鲁斋思亲诗次韵》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思亲情愫。挥笔写下了《思亲诗次韵》。其四云：

回首当年万里思，萱帷久旷许多时。云横葱岭云间望，梦入黔山梦里嬉。除却承欢无可否，从来远戍总乖离。御恩归省十三载，晨夕愁看母发衰。^{[6]154}

作为武将，杨芳常常远戍，尽管离家万里，但魂牵梦绕的是黔山黔水与家乡年迈的亲人。展示了武将的柔情与为人子女的孝思。

又如，吴嵩梁《悼亡儿诗》碑：

吾儿坠地气纵横，娱老初心望早成。万里提

携来绝缴，六年啼笑毕今生。人间沧影余夫妇，地下团栾汝弟兄。白发无多肠寸断，梨花夜雨哭清明。汝病沉绵已四旬，茶烟灯影对酸辛。谁知雪里狂游日，即是床前永诀人。仙药屡求方尚在，奇光聚落讫偏真。再来永线延年约，探取金环记夙因。^{[6]104}

吴嵩梁(1764—1834)，字兰雪，江西东乡人。清代中叶的著名诗人，有“诗佛”之称。道光十年(1830)，吴嵩梁以65岁高龄擢任黔西知州。上任即设书院、重文教、勤政清廉、课农桑，以民生为本，/深受百姓欢迎。该诗碑刻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春，是时任黔西知州的吴嵩梁，为悼亡子延春而书的诗作，碑文云：“吾儿延春一名，以晟生有至，性英气，吾笃爱之。今以病夭，卜葬东山，刻诗于碑，籍纾吾恻。”^{[6]104}小儿延春本聪慧，深受父母器重，谁曾料想只有六年的欢喜，结果阴阳两隔。诗篇将作者的期望与失望、欢喜与悲苦交织在一起描写，抒发作者在他乡僻壤老年失子的痛苦。

三、贵州历代诗刻的文学意蕴

贵州诗刻不但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具有浓郁的文学意蕴。诗刻刊载的是诗歌这种文学中的重要样式，诗歌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文学性，与刻石一结合，同时与具体的历史、地理环境相融合，张显出特殊的文学魅力。

（一）体现了诗歌文体的多样性

诗歌有多种体裁，这些体裁均在贵州诗刻中得到体现和运用。据表1《贵州历代诗刻统计表》，贵州诗刻涉及诗歌共340首，其中三言诗2首、四言诗（含铭）6首、五言诗（五古33、五绝26、五律48）107首、六言诗3首、七言诗（七古16、七绝97、七律97）210首、歌行2首、杂言2首、骚体1首、联句1首、赞6首。其中，五言和七言诗明显占多数分别占31%和62%，这两种诗体是古体和近体诗中最常用的体裁。此外，还有很多罕见的诗歌体裁，三言诗，如遵义《普济桥诗刻》。四言诗，如袁楠《杨汉英神道碑铭》、李化龙《铜鼎铭》、郭子章《建神武祠碑铭》、焦尔厚《饮泉铭》、鄂尔泰《铁柱铭》、勒保《铁柱铭》。六言诗，如周正己《临道使者六言绝句》。联句诗，如黄腾达《登城南甲秀楼联句》。以及歌行体，如毛振翻《惜春歌》、郑珍《游扶风山醉歌》碑。骚体诗，如王阳明《瘞旅文》等，众多诗歌体裁均在贵州诗刻中得到运用，充分显示出中国诗刻形式发展的丰富多样。

（二）保存和传播诗歌作品

贵州诗刻保存了很多珍贵的诗歌资料。例如，前文所引宋诸葛洞石壁诗。该诗署名景定辛酉戊戌月古随张汉英书。关于张汉英，史书记载并不详细，更不用说有关他的诗歌作品了。而且，这首诗歌作品与《诚谕文》一起，记录了南宋时期朝廷对贵州锦屏苗民的征讨，而关于这场十分惨烈的征战，史书阙载，使得诸葛洞石壁诗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以诗志史色彩浓郁。又如，和珅《飞云崖》诗刻，不见载于和珅《嘉乐堂诗集》中，在有关和珅的任何资料记载中都不见收录此诗。使得《飞云崖》诗刻成为和珅作品中特别珍贵的一篇，同时，也对和珅云贵之行中在贵州的行程有了具体的证据。

贵州诗刻中有很多诗歌并不是刻石者的原创，而是刻的前人作品。例如，李白的系列诗刻、曹唐《刘晨阮肇游天台》诗刻、王阳明系列诗刻等。这些刻石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对前人诗歌作品的保存和传播作用。

（三）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

诗刻因其永久性，且与名人、名地、名景一结合，产生了特殊的文学效应，更是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和源泉。例如，嘉庆时期遵义府尹赵遵律不但在桃源洞外建谪仙楼、怀白亭，而且将李白《白田马上闻莺》《赠徐安宜》二诗刻在桃源洞口，又将桃源洞与李白联结在一起，使得不少文人墨客慕名而往，以登谪仙楼、伫怀白亭，游桃源洞，一睹李白文化风采为快。一个桃源洞，增衍出大量文学篇章，其中诗刻数量居遵义地区诗刻之首。民国《续遵义府志·艺文志》说“此诗既经刻石，次韵者亦甚夥”，[8]这是很符合实际的。例如，张璐《播州桃源洞太白楼饯别周慎堂用太白马上闻莺韵》、李铭诗《桐梓驿读太白碑》、傅之奕《桐梓驿》、莫友芝《九日偕相庭登谪仙楼》《饮谪仙楼有怀昔游》、郑珍《桃源山歌》、张澍《九日怀白亭登高》《李白听莺处碑》、李铭诗《桐梓驿读太白碑》、吴嵩梁《观太白马上闻莺诗碑次韵》等^[9]。显然，很多诗篇是读罢李白二诗碑后有感而作，说明诗碑在传播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激发了文学的创造力。

又如乾隆时期，贵州按察使陈德荣游览贵阳雪涯洞后题刻《游雪涯洞》，其后“和作”“次韵”诗篇众多：杜诠《题来仙阁诗并序》、姜文泽《题来仙阁诗并序》、钱元昌《题雪压洞诗》《又题来仙阁》、王琼《雪涯洞次方伯陈公原韵》、刘应鼎《雪涯洞次方伯陈公原韵》、唐墩《雪涯洞次方伯陈公原韵》、姜文滨《雪涯洞次方伯陈公原韵》、潘淳《雪涯洞次方伯陈公原韵》^{[4]153—154}。这些“次韵”之作，显然是受到陈德荣诗刻的影响。而且，这些“和作”“次韵”之作也皆刻石于雪涯洞，在同一个景点，形成了系列诗刻。

再如，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所载甲秀楼十七组诗刻中，受鄂尔泰诗刻影响较大。冯光熊《和鄂太傅甲秀楼原韵》、陈淮《和鄂文端公诗》、乔用迁《步鄂文端登甲秀楼元韵》、翁同书《步鄂文端登甲秀楼原韵》、吴式芬《步鄂文端登甲秀楼原韵》、黄宅中《步鄂文端登甲秀楼原韵》、何冠英《步鄂文端登甲秀楼原韵》、孔庆瑚《步鄂文端登甲秀楼原韵》。^{[4]1~164} 这些“步韵”作品，均是在鄂尔泰甲秀楼诗刻基础上的增衍，足见诗刻与名胜结合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这些“步韵”的作者，多为清代在贵州为官的著名文化人物，故以甲秀楼为中心，自鄂尔泰开先河，所形成的系列诗刻，又充分见证了省外文化、文学与贵州文化及文学的密切互动。

参考文献：

- [1] (明)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贵州通志[M]//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成都：巴蜀书社，2006:485.
- [2] 何仁仲，等，编.贵州通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97-201.
- [3] 锦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锦屏县志 1991-2009（下）[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
- [4] 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M]//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1）.成都：巴蜀书社，2006.
- [5] 陆景川，主编.伟人名家与黔东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365.
- [6] 重庆市博物馆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 [7]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文物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59.
- [8] 周恭寿，修，赵恺、杨恩元，纂.（民国）续遵义府志[M]//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35）.成都：巴蜀书社，2006:543.
- [9] 周恭寿，修，赵恺、杨恩元，纂.（民国）续遵义府志[M]//黄加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34）.成都：巴蜀书社，2006：280-286.